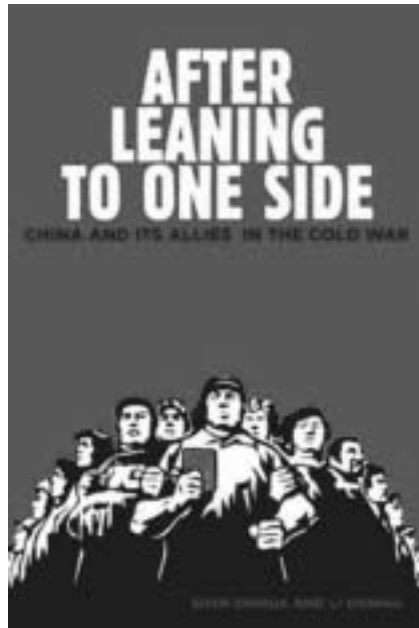


# 「一邊倒」之後：要主義， 不要利益？

——評Zhihua Shen and Danhui Li, *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 梁加農

《一邊倒之後》濃縮了作者近年的研究成果。該書不少內容已散見於兩岸三地的中文學刊中，這次合為一書，譯成英文，不僅利於國際交流，也提供了一部更完整的學術作品。



Zhihua Shen and Danhui Li, *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沈志華、李丹慧夫婦合著的英文新書《一邊倒之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及其盟友》(*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以下簡稱《一邊倒之後》，引用只註頁碼)，濃縮了作者近年的研究成果。該書不少內容已散見於兩岸三地的中文學刊中，這次合為一書，譯成英文，不僅利於國際交流，也提供了一部更完整的學術作品。

全書分三部：第一部「共產黨國家同盟的黃金時期」敘述了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一邊倒」與蘇聯結盟、1950年10月出兵朝鮮，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後不久朝鮮戰爭結束的蘇、中、朝同盟；第二部「兄弟關係的衰微」通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蘇聯在華專家的活動、聯合艦隊事件、大躍進、中蘇邊界問題及新疆伊犁—塔城事件，敘述了中蘇關係

走向衰微直至分裂；第三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等級制」敘述了朝鮮戰爭結束後的中朝關係、第二次越南戰爭後期(1968-1973)中美和解過程中的中越關係。

## 一 基本結論

《一邊倒之後》史料豐富，包括中、俄、美檔案，以及毛澤東與蘇聯領導人會談時的譯員李越然、中國總理周恩來軍事秘書王亞志的口述訪問等第一手史料。作者鉤沉發隱，在紛繁駁雜的史料中爬梳整理中國「一邊倒」向蘇聯、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以後，中蘇同盟的興廢及與之相關的中朝、中越關係的演化，提出了中蘇同盟分裂的核心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的結構性缺陷這一基本結論。

作者認為，和一般現代國家間關係講的是國家利益有所不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不講利益，講主義——誰是馬克思主義正統，誰是頭。中國「一邊倒」幾年後地位上升，而1956年蘇共二十大「自我批評」斯大林，自毀一貫正確的「老子黨」形象，還引發了波蘭、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始則懷疑蘇共及其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繼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能力，繼而爭正統、爭當頭。中蘇之爭的核心在主義，不在國家利益。利益是可以切割、妥協的，而主義卻只有一家真。因此，中蘇之爭是不可調和的，中蘇同盟的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頁251-55)。

不過，讀《一邊倒之後》，一方面可以看到許多支持和印證作者主

要判斷的史料；另一方面，又可以讀到不少與作者的基本結論互相衝突和矛盾的敘述。在書中討論的四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朝鮮、越南都常常表現為利益優先。作者指出，對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來說，與中國結盟只是維護其國家主權及強化他本人領袖地位的手段。冷戰時期，金主要便是利用中蘇矛盾從中漁利(頁217)。同樣地，中國面對朝鮮戰爭期間雙方積累的尖銳矛盾之時，也不是曉以大義，而是主要靠利益輸送來維持自己在朝鮮的影響。朝鮮戰爭後四年內(1954-1957)，中國向朝鮮提供了巨額無償援助80,000億元(舊幣，折合8億元人民幣)，折合16億盧布，並免去戰時借款合計7.29億元人民幣(頁200)。

就是中蘇兩國在重大問題上也往往是利益優先。書中開篇說到，1950年初兩國經過漫長的談判後簽訂新約、正式結盟，蘇方為此作出了較大的妥協和讓步。作者分析蘇方之所以這樣做，一是由於中國在談判中也作出了重大妥協，接受了蒙古從中國獨立出去的事實；二是出於在與美國冷戰中拉攏中國站在自己一方的戰略考慮(頁12-14)。這其中的關鍵，都不是主義，而是利益的考慮。而中方在談判中力爭的重點也是中長路、旅順港等重大國家利益(頁10)。

中蘇結盟後四個月，朝鮮戰爭爆發。斯大林為甚麼改變初衷、同意金日成發動戰爭統一北南朝鮮？與一般認為這與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 1950年1月的演說——將南朝鮮排除在美國防衛圈之外——有關的說法不同，作者重申了一個重要論點，那就是中蘇新

作者認為中蘇之爭的核心在主義，不在國家利益。利益是可以切割、妥協的，而主義卻只有一家真。因此，中蘇之爭是不可調和的，中蘇同盟的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

書中所顯現的矛盾，恐怕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內在矛盾的一種反映。理想主義和現實政治、國際主義和民族利益等常常交融在一起，使冷戰時期的中國及其盟友也呈現出歷史的多重面像。

約將使蘇聯喪失其在太平洋的唯一不凍港、出海口旅順，而奪取南朝鮮的仁川、釜山等不凍港將是替代位於中國的旅順軍港的不二之選（頁22）。這又是一個出於利益優先的考慮。當然，這個論點本身也有可議之處；作者也審慎地註明此為推測，迄無直接的文獻證據（頁46）。再者，北朝鮮境內就有多個不凍港，如清津、南浦、元山等。外事謹慎的斯大林似乎不會僅僅為了仁川、釜山而不惜一戰。

書中末篇講到1968至1969年中國出於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開始轉向尋求與美國和解。在1971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訪問北京後，周恩來隨即飛往河內向盟友越南通報。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筭當面頂撞周說：「越南是我們的國家，不是你們的。你們沒有任何權力和美國人談越南問題。」（頁234）隨後，越南總理范文同致信毛澤東，要求中方取消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訪華的計劃。這一次，毛不講主義，講利益，拒絕了越方的請求。不過，和對朝鮮一樣，中國又是靠利益輸送來拉攏越南。1971至1973年間，中國向越南提供了巨額無償援助90億元人民幣，運往越南的軍用物資超過過去二十年的總和（頁243）。

書中所顯現的上述矛盾，恐怕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內在矛盾的一種反映。理想主義和現實政治、國際主義和民族利益等常常交融在一起，使冷戰時期的中國及其盟友也呈現出歷史的多重面像。

## 二 不同見解

《一邊倒之後》出版前兩三年，在美國出版了另外兩部主題相近的專著。三書作者所見的基本史料大致相同，但解讀的角度卻有所不同，得到的結論也不盡一致。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授盧瑟（Lorenz M. Lüthi）的《中蘇分裂：共產黨國家間的冷戰》（*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認為，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在於意識形態，但同時強調毛澤東、赫魯曉夫的個人因素。盧瑟說，如果斯大林晚死幾年，毛不敢像對赫魯曉夫那樣心存異想；或者毛早死十年二十年，中蘇也不會反目成仇。他的結論是，在中蘇國力相差懸殊的條件下，以為僅僅靠意識形態就可以挑戰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只是毛個人的一廂情願而已<sup>①</sup>。這



盧瑟認為，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在於意識形態，但同時強調毛澤東、赫魯曉夫的個人因素。

實際上提出了中蘇分裂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和個人主動性因素的問題。

《一邊倒之後》也指出，儘管斯大林「欺負」毛澤東，但毛還是服從斯，「一邊倒」向蘇聯（頁254）。作者分析了1958年中蘇分裂肇始時的聯合艦隊事件，指出蘇方所為符合國際慣例，赫魯曉夫也未曾「欺負」毛。對於毛對盟國間一項正常、互利的軍事合作建議的過度反應，外事粗疏的赫魯曉夫很長時間都想不明白，晚年回憶說可能是觸及了中國主權（頁154）。這也是後來中國主流的一個解釋②。不過，毛對國家主權高度警覺的說法與史實並不相符。1950年代初，中方曾主動邀請蘇聯空軍進駐中國東北和上海。1957和1962年，中方又將中國領土白尾龍島和多半個天池分別劃給越南和朝鮮③。

《一邊倒之後》也不同意國內主流的解釋。作者認為，蘇方關於組建聯合艦隊以及在中國海南島合資建立為在太平洋游弋的潛艇導航的長波電台的建議，並沒有觸犯中國的主權。毛向蘇聯人「發火」，乃是自以為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可與赫魯曉夫平起平坐了（頁154-55）。只是，毛的這種過度反應，在黨內分裂事件中不止一見。如紅軍長征途中第一、四方面軍草地分家的「南下電令」、文化大革命時「林彪事件」中的「第一個號令」等，往往是由毛的猜疑心作祟所致，而這又常常與他對個人領袖地位和權力的高度敏感有關④。對這一方面的因素，史家也應重視，不當一筆帶過。

1966年3月，已「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拒絕了派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邀請⑤，終結了兩黨關係。此前，已明確為毛的接班人的劉少奇在1960年12月訪蘇時，曾在臨時準備的公開演講中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他1921年第一次到蘇聯後加入共產黨：「從那時候起，我就為擁護蘇聯、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而努力。」⑥盧瑟認為，毛終結兩黨關係與他此時部署文革有關，有倒劉的黨內鬥爭利害考慮⑦。

英國諾丁漢大學 (Nottingham University) 寧波分校高級講師拉欽科 (Sergey Radchenko) 的《天上的兩個太陽：中蘇爭奪霸權的鬥爭》(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認為，毛澤東比任何人對中蘇分裂要負更多責任；而雙方領導人又由於歷史和個人原因，相互存有很深的偏見。蘇方無法理解中方在同盟中處於弱勢的憂慮，中方則



拉欽科認為，毛澤東比任何人對中蘇分裂要負更多責任。

冷戰時期的中國有四個社會主義鄰國：蘇聯、朝鮮、越南和蒙古。遺憾的是，《一邊倒之後》沒有討論中蒙關係。獨立的蒙古在中蘇分裂時倒向蘇聯，大軍壓境的威脅使由意識形態開始的中蘇分裂終於不可逆轉。

與其說朝、越作為中國的盟友是基於甚麼主義，不如說是中國靠巨額援助收買了它們。在高喊主義的表象下，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問題上的表現仍然是現實、理性的。

常常將蘇方真誠和解的姿態視為陰謀<sup>⑩</sup>。1969年10月中蘇邊境談判前夕，中國因憂慮蘇軍以談判為掩護進行核突襲，而展開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動員——95個陸軍師、4,100架軍機和核武裝力量「第二炮兵」進入一級戰備。而今天看來，這似乎是虛驚一場<sup>⑪</sup>。

### 三 爭議空間

冷戰時期的中國有四個社會主義鄰國：蘇聯、朝鮮、越南和蒙古。遺憾的是，《一邊倒之後》四缺一，沒有討論中蒙關係。獨立的蒙古在中蘇分裂時倒向蘇聯，1966年1月簽訂《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讓蘇軍進駐蒙古，1968年已達6個師，同時另有16個師進駐中蘇邊境<sup>⑫</sup>；而此前邊境很少駐軍（頁140）。蒙古在地理上直面北京、居高臨下，如蘇軍由此南下，將危及中國首都安全。有研究者認為，大軍壓境的威脅使由意識形態開始的中蘇分裂終於不可逆轉<sup>⑬</sup>。作為局中之人，毛澤東後來也曾說中蘇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兩條：一是從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開始蘇方在意識形態論爭中的「錯誤」做法，二是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以後蘇軍陳兵邊境<sup>⑭</sup>。

蒙古與尚處於國家分裂、急需中國這個大後方支援的朝鮮、越南形成對照。朝、越在中蘇分裂時基本採取等距離外交，以獲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拉欽科認為，與其說朝、越作為中國的盟友是基於甚麼主義，不如說是中國靠巨額援助收買了它們<sup>⑮</sup>。

從一個縱深的角度來觀察，在高喊主義的表象下，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問題上的表現仍然是現實、理性的。以後的歷史發展也是如此：越南在中蘇共同支援下完成統一後不久就與中國反目成仇；即便是在意識形態完全淡化的今天，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還是寸土必爭。朝鮮金氏政權已歷三世，在朝鮮核問題上，又何曾聽過中國的招呼？這也難怪。對當年中國搞不搞原子彈，蘇聯也作不了主。至於在蘇聯解體後走向民主社會的蒙古，與中國仍保持距離。就是冷戰後期一度的社會主義國家柬埔寨，其總理波爾布特（Pol Pot）也認為，柬埔寨作為近鄰中國的盟友具有獨立於親密意識形態關係之外的國家利益基礎，那就是對付越南。因此，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北京「政變」，他判斷中東關係不會因此生變<sup>⑯</sup>。事後證明波氏的眼光是準確的。

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同盟關係也有一個發展過程。類似《一邊倒之後》所敘，中蘇、中朝、中越間同盟的矛盾、分裂，也曾見諸近代西方。高度穩定的西方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美日安保條約，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而且也講主義，即美國、日本及歐洲等盟國具有的共同價值觀<sup>⑰</sup>。

讀《一邊倒之後》這樣宏大的歷史敘述，自然會帶出一些問題。其實，早在中蘇分裂之初的1961年，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便曾對「一邊倒」有所評論，謂中國「不應『一邊倒』，為C.C.C.P之附庸」，而應「效唐高祖

臣事突厥，藉其援以成事建國」<sup>⑥</sup>。換言之，中蘇同盟應作權宜之計。而《一邊倒之後》認為，毛澤東與蘇聯結盟的初衷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基本國策（頁xiv）。只是世事難料，僅僅十年中蘇就分裂了。今天我們考察中蘇同盟時，雖然面對的都是距今不遠的事，也有大量文獻可用，但涉及中蘇核心層對一些敏感問題的決策過程，研究所需的直接史料並不是所在皆有。對「一邊倒」之後中國及其盟友的關係所見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

#### 註釋

①⑦⑩ 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345, 350-52; 301; 340.

②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頁640。

③ 有關中朝天池問題的最新研究，參見沈志華、董潔：〈中朝邊界爭議的解決（1950-64年）〉，《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年4月號，頁34-51。

④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長期同事周恩來、楊尚昆等都指出過毛非常多疑、對領袖權力特別看重等負面性格問題，參見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頁128；張培森：〈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頁30。

⑤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

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04。

⑥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928。

⑧⑩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9), 17, 22; 72.

⑨ Lorenz M. Lüthi, "Restoring Chaos to History: Sino-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0 (June 2012): 390-94.

⑪ Mark L. Haa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1789-198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4.

⑫ 〈關於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等問題的談話要點〉（1973年12月12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同希思談話內容的通報〉（1974年5月2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89。

⑬ Philip Short,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London: John Murray, 2004), 362.

⑭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52, 183-84.

⑮ 參見吳宓：《吳宓日記續編》，第五冊（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60。

梁加農 加拿大麥格納公司工程師，  
六西格瑪 (Six Sigma) 黑帶。